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1.02.006

· 比较教育 ·

## 对发展比较军事教育的几点思考

——在全军“比较军事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摘录

杨保明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84)

**[摘要]** 发展比较军事教育, 是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必然要求, 也是广大军校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要充分认识比较军事教育的重要地位作用, 有一种为院校教育发展高度负责的执着精神, 将发展比较研究看作面向世界的要求, 把比较军事教育这门科学作为很好的锐利武器、科学的工具, 更加全面、更加科学、更加理性地认识他国的经验, 既要摒弃简单的“拿来主义”, 又要勇于实事求是地洋为中用, 推动我国军事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比较军事教育; 地位作用; 发展; 思考

**[中图分类号]** E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1)02-0020-04

### Some Though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Military Education ——Excerpts from the Speech at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n Comparative Military Education

YANG Bao - ming

(Shijiazhuang Army Command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084,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military education is essential to push forward th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been the common wish of the faculty in the military academies for long.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fully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comparative military education, to persevere in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developing the education of military academies, to regard it as the requirement for keeping the world in view, and to use it as a powerful weapon and scientific tool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 wholly,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We shouldn't simply "import" it from abroad, but use i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ur military educ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military education; role; development; thought

比较教育的创建至今已有近200年。我国的比较教育和军队的比较军事教育发展, 大体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年来, 在总部机关的指导和有识之士们的大力支持下, 比较军事教育的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2009年3月, 总部委托中国军事教育学会和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联合举办了“全军军事教育及研究生教育理论骨干集训”, 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比较军事教育的集训。同年10月, 中国军事教育学会和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又成功承办了“中外军校院校长研讨交流会”, 来自7个国家13所中高级军队院校的院校长齐聚一堂, 围绕信息时代作战指挥官培养课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 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和友谊。2011年4月, 我军第一次“比较军事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国防科技大学正式举办。这说明比较军事教育经过多年的积淀正在发轫, 将在我军院校教育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 一、发展比较军事教育已经具备有利条件

比较军事教育近年的快速发展并非偶然。我军院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 使发展这项事业的条件更为充分。

第一个条件是有需求。2006年底, 胡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深化军队改革提出了明确的任务, 军队建设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跨越式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这种形势下, 发展比较军事教育, 真正从规律上去掌握现代军队院校发展的走向和趋势, 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建国初期的上世纪50年代, 我们曾系统学习前苏军的教育经验, 如果说那是我军院校教育的首次对外开放, 那么现在已经算又一次开放。但是开放的程度比如深度上, 好像还没有达到那一次。老同志和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 那一次我军是全面地向前苏军开放, 向“东方

**[收稿日期]** 2011-05-25

**[作者简介]** 杨保明, 中国军事教育学会副会长,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教授, 少将。

阵营”开放，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几乎把前苏军的院校教育模式整个地搬过来。不管东西方的军事教育有多少区别，但是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两个超级大国本身的军事实力就不相上下，我们把其中一个的体系全部拿过来，力度是非常大的，它使我军的院校教育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较高水平。但即使在那样开放的情况下，也没有听说过“比较军事教育”的概念。在当时留下的历史文献中，包括领导讲话和我们内部发生的争论中都没有。尽管比较教育产生一百多年了，很可惜像那样大规模地引进，我们却没能运用这门科学去进行研究。虽然那种大规模的引进最后以不愉快的结果告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掌握比较科学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研究深化军队院校的改革，应该把比较军事教育这门科学作为很好的锐利武器，或者科学的工具，来解决应该解决的现实问题。我认为，有需求主要就是指着这个形势。

第二个条件是有呼声。大力发展比较军事教育，是广大军校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我们军内有大量的比较军事教育的热心人，有大量执着的追求者，这些同志常年孜孜不倦地追求这门学问，既包括很多老同志，也有大量年轻的同志。比如炮兵学院的王春茅教授，在我的脑海中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多少年来他一直非常关注比较军事教育，亲自主持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大量学术成果，不但自己研究，而且积极地倡导。直到退休前，他还给好几所有关院校的首长、机关领导和同行写信，我至少收到过三封，强烈要求建立比较军事教育这个分支学科，反复建议举办全军性的学术研讨活动，这种责任感和热情十分可贵，令人感动。这次全军第一次“比较军事教育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他的愿望。当然，像王春茅教授这样的热心人还有很多，对发展这项事业抱有热切期盼的人也有很多。任何事情都得有人去追求，有人去主张。我想本次会议的召开，既是他的愿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共同表明了一种我们要大力地发展比较军事教育的一致愿望。

第三个条件是有基础。本次会议的召开有着雄厚的组织基础，或者说积累。2009年3月，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曾举办过全军军事教育理论骨干和研究生教育骨干的集训，那次集训的主题实际上也是一次比较教育研究，只是没有正式冠名。集训内容共分为五个单元，全部为比较教育的相关内容，并聘请了一批军内外专家作专题报告，会期比较长，历时13天。与那一次活动相比，本次研讨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我军第一次由总部指导的、官方和民间相结合的、正式冠名以“比较军事教育”的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荣幸举办这样的一次会议。本次研讨会的名称意义重大，就叫“比较军事教育”，等于打出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方向。说明我们这个学问做得正值方兴未艾，不是说已经要总结了，而是刚刚开始，意义之重大，从中可以窥见一斑。

## 二、充分认识比较军事教育的重要地位作用

发展比较军事教育，是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必然

要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我仅从研究任职教育的角度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人才培养机制。我们曾经到法国的高等国防研究中心参观，一位上校介绍完情况后有一个互动环节，代表团一共提出了四个问题，对方都进行了相应的回答，每一个回答都给我们很大的震动，可以说是“四个震撼”。第一个是问他们学员毕业后的使用率，这实际上是问“训用一致”情况。我军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同层次还有明显不同，生长军官问题不大，因为我们淘汰率很低，基本上是训用一致。关键是高中级院校中做不到，而且还有较大差距。法国的高等国防研究中心相当于我们的国防大学，是培养将军的地方，他们在回答说：我们的学校每年只培养25名学员（这与法军总员额的需求基本一致），毕业后肯定会得到提升，还有一些没有到这里学习的人也可能晋升为将军。这说明使用率是百分之百，这是第一个震撼。外军是很讲效益的，如果不可能得到晋升，国家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来培养。第二个问题是我提的，因为我来自院校，很想知道他们教官的情况，我问的是具备什么资格的人才能到这里来当教员，要干多长时间，干完了以后到哪里去？结果他们的回答又震动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员，教员都是外聘的政府高官或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们临时来讲课，讲完就走了，我们总共编制五个人，除两名正、副职以外，还有三名上校顾问，编制上没有教员。第三个问题是问学员管理怎么搞，对方开始没有听懂，问我们指的是什么管理，我们解释说是指学员的日常行政管理。结果他们说，我们没有这项管理，如果一定要有的话，那就是由原单位管理，学校自己不进行管理。当然，高级培训和我们通常所见的大多数院校还是有所区别的，但这也给我们不少启示。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考试的，问他们有没有闭卷考试？我们国防大学的学员年龄相对比较大，对这个问题很关心，结果对方回答，他们也有这种考试，但不是由高等国防研究中心考，而是由各军区的参谋长来考。这又是一个震撼。理念的不同，他们的教学和实践的结合程度非常高，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任职教育的启示。

我们由此看到了我军的人才培养体制和西方发达国家军队之间的差距。其实通过其他渠道还可以了解到，不仅是发达国家，包括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军队，甚至非洲最穷的国家（人均GDP达不到我们十分之一）的军队，基本上都是这种教育理念，说明经济社会发达程度与观念虽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们的人才培养体制大多比我们要先进。实际上胡主席对此早就有明确的指示，在2006年全军军事训练会议的讲话中，就已经清楚地指出，我们也要建立和完善这样一种“以提高能力为核心、培训与使用紧密结合的军事人才全程培养机制”。但目前和培养体制上，我们与外军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军队院校的办学定位。这个问题我们也能够通过比较看出来。回顾我军院校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建国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新中国建立到1973年，即到十年动乱后期的院校恢复，是军队院校发展的第一次飞跃。这次飞跃的鲜明特点，第一是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人民军队的正规院校体系。战争年代的院

校主要是随营性质,建国以后进入和平时期办学,建设正规化的院校体系,这是重大转变。第二个特点是开放,新的院校体系不是完全靠自己探索的,是借鉴了世界上一个先进国家的体制。第三个特点是任职教育特色鲜明,那个阶段基本上没有学历教育,不存在院校培养的学生到了部队以后不受欢迎的情况。总体来讲,院校培养的学员回去以后动手能力强,部队都很满意。第二次飞跃是从恢复院校开始。从1969年到1973年4年期间,全军的指挥类院校只剩下北京的一所高级军政学校。从1973年的院校恢复到2003年,这三十年的时间,是第二次飞跃。这一阶段,有几个共性的特点。第一个是恢复。从本来健全的体系,到十年动乱大部分被损坏,当局势稍有松动,老一代革命家就抓紧逐步恢复。当时小平同志指出,把能恢复的院校都恢复起来。恢复也会带有某种问题,好的方面是又回归到了规律,不足方面在于时过境迁,时代又向前发展了,完全恢复到原来状态可能不适应新的环境,这就是恢复会带有简单重复的痕迹。第二个特点是和国民教育接轨,这是第二次飞跃最大的亮点,与第一次飞跃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军事教育普遍规律已经证明,不融入国民教育,不走共同的发展之路,想走出一条现代军事教育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我们通过依托培养,加强了学历教育,这是第一次飞跃中所没有的。第三个特点是探索。折腾比较多,说明对规律的认识不清楚,盲目性较大。从2003年开始,或者说以1999年的第十四次院校会议为基础,我们又开始了新的飞跃。这次飞跃,保留了第一次飞跃的合理内核——任职教育特色,也就是军事教育的本质特征,因为军事教育的本质是职业教育,现在总部的文件里基本上也这么框定,但同时也保留了第二次飞跃的合理内核——学历教育,与国民教育接轨。这就使第三次飞跃成为可能,这个新飞跃建立在在前两次飞跃的基础之上,是军队院校发展历程中一次新的质变。简单说,第一次飞跃缺少学历教育,第二次飞跃中职业教育特征有所模糊,第三次飞跃便将方向定为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相对分离,以任职教育为主。

这三次飞跃的发展过程,完全符合哲学和历史的逻辑,都是围绕规律在转,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但它很清楚地说明,如果我们从一开始,或者从再次开放的初始,就将军队的眼光同国家的改革开放一样扩展到世界,恐怕我们就能更早地发现规律,就会少走许多弯路。

第三个例子是教员队伍建设。从任职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教员队伍建设存在相当大的差距。2006年,国防大学代表团出访埃及和土耳其,回国后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三个问题,即联合作战人才培养、院校教员经历单一和“训用一致”问题,引起军委首长高度重视,胡主席作了重要批示。报告中提出的院校教员经历单一问题,在任职教育院校非常明显。这一点就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及早了解和掌握外军院校的做法,特别是发达国家、军事强国院校教员队伍的结构,我们本来应该极早地发现这个规律。刚才讲到的法国高等国防研究中心是一种情况,但包括美国的国防大学在内的大多数院校是有教员的。他们的教员分为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教官,即与部队进行交流的指挥军官,三年或两年一换岗,他们的存在能够保证院校教学的内容和院校管理,始终符合部队实践的需求。第二种

是专职教员,类似于目前我军院校的教员。第三种是外聘的临时教员。我们现在虽然看到了这个问题,但很不好实现,主要原因是第一种很难落实。由于方方面面的因素,我们无法建立军官轮岗制度,从而导致教官制非常难实行。目前采取的都是些过渡性措施。最早的试点是在国防大学2004年进行,13个教官,工作两年回去以后,多数的没有被用起来,有的甚至转业或其他处理,最后证明这不是一种双赢的政策,对院校有用,但对干部发展不利,到第二批就没有人来了。后来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聘用退役军官,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个办法没有搞起来。目前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每年从部队选拔一批相应级别的指挥军官,到各级指挥院校进行为期一年的代职。这种做法也是问题重生,首先是时间短,对于院校来讲,时间短有违教育规律,这些教官刚刚了解情况,能够做一些事情,又该回去了,这对资源也是一种浪费。但时间长了又不行,他们离开部队时间越长,对其自身以后的发展的影响就越大,因此时间越短就越理想。与我军不同,外军的指挥军官不存在这种问题,它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没有自己固定的单位,一个是不存在回哪儿的问题,永远在流动,每个岗位都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必经之路,三年必须从某一单位离开。比如你在某个部队当了三年的团指挥官,就可能让你到中级院校担任三年教官,只要教官当得好,继续往前走,但不会叫你回到原来的单位,而是晋升到另一个部队或机关的岗位。从发达地区来的,可能要去艰苦地区;从艰苦地区来的,可能会到发达地区去,非常公平。我们现行的是多年难变的传统做法,“马太效应”非常严重。往往是“一岗定终身”,岗定得好优势加优势,岗定不好劣势加劣势,两极分化,这确实值得研究解决。我军还存在不少世界各国军队中难得一见的概念,比如老基层、老院校、老边疆、老机关等,实际上只要有其中一“老”,综合素质就无法提高,因为他只会干那一项,而不会别的。外军军官的综合素质较高,原因之一就在于普遍轮岗。这种制度在我军建立起来非常困难,教官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可见,这些问题也是通过比较发现的。

再比如训练机构的设置。外军的院校,尤其是指挥院校规模普遍不很大,再高级的院校,也可能只有一座小楼,便能满足学校教育的功能,不像我们,所有的院校似乎都是办社会,负担非常重。这可能与我们的社会化水平有关,但我觉得也未必,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比我们落后得多,但照样可以做到,我认为有些还是托词,还是没下决心。在训练机构的设置上,能看到很大的差距。外军院校规模相对较小,是因为其分工非常清楚,院校主要负责完成理论课程的研修,都是室内的,理论课程的研究完成后的动手能力练习,不在学校内进行,而是到专门的训练基地,基地的模拟环境、实兵环境、大型训练设施、新式武器装备一应俱全,在这里进行动手能力的训练,训练结束后可以到一支部队,参与指挥部队的演习。这种模式实现了部队——基地——院校的资源共享,是一种集约化的设置。这与我们有很大区别,我们现在是小而全,大而全,无论大小,都要求非常全面。有人做过计算,按照我军这种训练保障的开销,就是美军也无法负担。我们的经费很多花在了楼堂馆所的建设上,而实际上训练需要非常大的

花销，一枚靶弹，一架靶机，都是钱，你就得把它打掉，但在这些关键环节就没有钱了，在这些真正打仗用的资源上，捉襟见肘。外军的训练基地与我们也不同，利用率非常高，一般分专业基地和综合基地两种：专业基地主要进行各兵种专业的分业训练，综合基地主要是进行合同作战以上的演练。基地的职能，通常是这两个月负责训练某一个学校的中级或者高级指挥员，接着可能是两个师来演习，每年的任务负荷很满。部队和院校并没有自己专属的完备训练设施，包括西点军校暑期的野兽营训练，也是在别的部队找合适环境进行。可以想见，院校、部队、基地都要各搞一摊子，利用率能有多高？即使搞出来，也很难达到真正完备的水平。外军这种训练资源的集约化设置，对我们又是很大的启示。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比较，要得到这种认识也是不可能的。

### 三、寄望于比较军事教育有一个新发展

要将发展比较研究看作面向世界的要求。小平同志早就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这对于军事教育的发展同样是重要指导。我认为，面向世界千万不能被神化，不能简单看成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我们可以很好地想一想，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应该说首先是对外开放，在一定意义上是开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哪儿来的，是不是从当时最先进的欧洲来？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最大的“舶来品”。我们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军队院校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党和中国特色的事业，并不是仅仅靠中国这块土地自己就能产生出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本身就不能脱离开放，也可以认为是比较研究的结果。比如当时有多种救国的理论，为什么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经过比较，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进行反复比较做出的选择。这么正统和光明正大的事情，我们现在却批起自己来了，一研究外国的东西就瞻前顾后，这是一种短视。我在首都机场看到一幅商业广告，有三句：视界决定境界，气度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视野很小就不会有什么境界，非常有道理。所以我认为，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是要不要、会不会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问题，这个优良传统最根本的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站在这个高度去认识比较的问题，最起码研究得不够。

要有一种为院校教育发展高度负责的执着精神。做学问必须要有一种执着的精神，成就任何事情都得靠一大批具有这种精神的人。金一南教授最近给总参读书班讲了一课，题目是“学习党史军史，坚定理想信念”，他刚写完《苦难辉煌》，讲得确实是栩栩如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讲到中国革命事业时说，开创一个新世界不是我辈之人能够做到的，他说要有一种“真人”，就是那种抛弃了自己、超越了自我、心中只有他所追求的事业的人。他举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的逆境，陈独秀在党的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他不失为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面对当时的落魄，身边几个家中的下人劝他说，咱们家在北京还有几个铺面，还能维持生计。如果比照现在北京的房价，

这对任何人都会是巨大的诱惑，都会去追求。可他却说要去你们去，这些东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一种真正在追求事业的人，他们看不起这些市井之物。毛泽东和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一些“真人”。我们并不是要今天的大家都要抛家舍业，而是要提倡学习这种精神，对一切有意义的事业要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我们现在研究军队院校教育，研究比较军事教育，同样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在这一点上，需要很好地向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学习。

要克服影响改革的不良心态。我认为深化军队改革举步维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一些影响改革的不良心态。第一种是盲目自满。比如对打赢未来战争，认为我们这支军队从来都是以劣胜优的，别看现在这不行那不行，打起来照样能保证赢。这种心态是很危险的。这些同志并不真正了解党和军队的历史，也并不了解我们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处境的凶险。实际上只有深入到军事斗争准备一线，才能增强一种紧迫感。现在的战争不是靠徒手搏斗，有阶级感情、有深仇大恨就行了，你没胆子我有胆子，你怕死我不怕死，过去靠这个就可以取胜。现在我们还要坚持人的因素，但现在人的因素不只是指不怕死，还有人的科技素质，装备靠人来造，武器靠人驾驭，所以情况变了，即使你不怕死也不行，任何轻敌麻痹都很危险。第二种是作风漂浮，大而化之。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心态。你叫我改革，我就搞花的，就出现了我们现实中的改过去叫改革，改回来叫深化改革，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我们搞比较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真正抓住点东西，专门做学问跟一线同志搞研究还是有区别的。一线工作者可以结合自身的经验谈体会，而做学问需要扑下全部身心，需要按照规律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比较科学中有一些固有的要求，或者是多年沿袭下来的很有效的办法，如比较的“四步法”——描述、解释、并列和分析，如空军雷达学院蓝江桥院长所强调的比较研究的“三个化”——系统化、文化和量化的研究，还有很多好的方法。如果你对一事物，不能首先做到很好地描述清楚，也很难去解释。比较教育在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著作和成果，但是往往抽象的过程差一把火，究竟规律是什么？现在客观介绍（虽然这些客观介绍也不一定都非常准确）有很多，但在客观介绍的基础上如何对规律性的东西进行进一步抽象，结合我们的国情军情究竟有哪些可以用那些不能用，应该如何结合实际去运用和借鉴这些规律？这是一个艰苦劳动的过程，需要我们大家很好地下功夫。第三种是利益驱使。我们在研究比较军事教育的时候，一定要跳出个人、所在单位这种狭隘的思维习惯，要从全局去着眼，甚至不妨“小官说大话”。搞研究的目的是给高层、给决策层提供咨询，我们要负责任。现在很多改革搞不下去，认识难于统一，就是因为既得利益作怪。比较研究是一门科学，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科学一旦掺杂进去私念，就会给事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比较军事教育尤其需要注意，它的研究对象涉及不同领域和各类不同的院校，研究队伍也来自不同的单位，对这一点就更要加以强调。

（根据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卢绍华）